

中国记者丛书

刘尊棋

通讯杂文选

TONGXUN.
ZAWNXUAN

新华出版社

刘尊棋通讯杂文选

刘尊棋通讯杂文选

刘尊棋 著

•
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
787×940毫米 32开本 5.75印张 插页2张 91,000字

1989年4月第一版 1989年4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1—0338—O/G·95 定价：1.85元

前 言

《中国记者丛书》将汇集几十名当代优秀记者的新闻作品，以系列书的形式分册出版，奉献给新闻工作者、新闻爱好者和广大读者。

新闻记者是政治家、社会活动家，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他们既是时代的传播者，前进脚步的讴歌者，又是历史的纪录者、见证人。在战火纷飞的一九四七年，郭沫若同志曾写过一篇文章，满腔热情地歌颂革命转折关头时期的新闻记者。他写道：“无数勇敢正直的新闻记者，他们正是今天的左丘明、司马迁，我倒感觉着我们今天的文坛上应该推他们为祭酒。”“新闻记者的报告文学应该是最新最进步的一种文艺形式。把现实抓得那么牢，反映得那么新鲜，批判得那么迅速！它们成了我们每天的生命。我们每天清晨和晚上，就象中世纪的人要受神的启示一样，我们是受着新闻记者启示的。有哪一种文艺作品能抵得新闻文学的力量呢？有哪一位大作

家能有新闻记者的读者那么广泛？……”（见《文萃》杂志刊载的《新缪司九神礼赞》）郭老把记者比作左丘明、司马迁，要把他们推为文坛“祭酒”，这虽然有些过誉，但他确用诗一般的语言写出了新闻记者的功绩和作用，写出了新闻作品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和威力。这对那些几十年昼夜奔波在生活激流中的优秀记者来说，评价是公允的，当之无愧的。

为了使读者更多地了解记者，熟悉他们的生活，欣赏他们曾对人们有过启示作用的名篇，并从中学到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和采访写作经验，这本丛书将有如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注意汇集各个时期记者中的代表人物，反映各个时期新闻工作的特色和风貌。选入丛书的人物中，有在苦难的旧中国就投身新闻事业的新闻界前辈，有革命烽火中百炼成钢的党的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有全国解放后在党的哺育下锻炼成长的新闻战士。时期不同，成长道路不同，活动方式不同，新闻写作的特点也有所不同。这样，从这套丛书中既可以看到百花齐放、兼收并蓄的特色，又可以看出几十年来我国新闻战线群星灿烂、前赴后继的局面。

其次是尽量选录各个人物的代表性的作品，揭示每个人物的写作特点和新闻风格。在这本丛书中，有战地新闻通讯选、考察报告选、人物专访

选、农村散记选、经济新闻选、社会调查报告选、报刊杂文选、国际新闻通讯选、国际评论选、东北战场通讯选、西欧战场特写选等几十种。记者经历不同，活动领域不同，新闻体裁不同，写作上的风格也就有了不同。这样，就构成了一个新闻风格、新闻体裁上的五彩缤纷的百花园，为读者在新闻写作上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范例和范文。

再次是，每册正文之前有作者的小传和近照，正文之后有编后记、作品评介、或作者自己撰写的类似“我是怎样当记者的”、“战地采访日记”等各种形式的介绍评析性的文章。这样就把每个人物的生平、特点、概貌勾画出来了，既为读者学习这些优秀记者的范文提供了背景材料，又为新闻研究人员探索新闻界名人成长道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

为了使这套丛书自成体系，有一定的完整性、连续性，全书虽有几十册，但规格是统一的。每册不超过八万字，精选精编；装璜设计一律，力求美观大方。为了便于携带，全部采用窄32开本。这些做法是否有当，编辑出版工作有何疏漏，请读者指正。

这套丛书由新华社新闻研究所和新华出版社共同编选出版。



刘尊棋小传

刘尊棋，原籍湖北鄂州市，1911年6月5日生于宁波，在北京读过小学和中学，1928年毕业于北平基督教青年会财政商业专门学校后，入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任秘书，同时为该系旁听生。1930年3月与姜凝先、谢冰莹、冯仲云、王冶秋等组织文学团体“展望社”，同年9月与段雪笙、潘训、郑蜀子、杨刚、陈沂等组织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平分盟并任理事，翌年(1931)1月经郑蜀子介绍及当时北平市委书记任国桢谈话，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被捕，后关押在北平草岚子胡同监狱，1933年5月经中国人权保障同盟营救，无条件出狱。但国民党反动

派，捏造了假的“退党启事”刊诸报端，狱中的地下党支部误中敌计，开除刘的党籍。

刘出狱后再度被塔斯社聘为翻译兼记者，并与张友渔、徐冰等同志组织“世界论坛”社。后又在党的安排下，对阎锡山的将领杨爱源及由欧洲返国的张学良将军进行抗日宣传工作。1934年秋，塔斯社北平分社撤消，刘被聘为《北平晨报》记者、评论员。1936年3月《北平晨报》被反动政府武装接管，刘受中央通讯社聘任驻东京记者，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刘返国至上海，与胡愈之、钱俊瑞等从事国际宣传工作；上海沦陷后改任中央社战地记者，先后在江南及华北各地写了很多通讯报道，1939年9月曾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同志。在这次访问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著名谈话。1941年1月新四军事件后，刘被“疏散”至新加坡，在胡愈之任主笔的《南洋商报》任编辑主任，同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迫临新加坡，1942年2月刘经缅甸回国，同年底任美国新闻处中文部主任，同时与孙伏园、陈翰伯等创办中外出版社，出版国际问题书籍和《文汇报》。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由重庆到上海，辞去美国新闻处职务，创办《联合日报》及《联合晚报》。1946年4月两报被反动政府封闭，刘获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奖助金到美国参观访问出版

事业一年，1947年3月离美返回香港，主编英文《远东公报》，作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报共同的对外宣传刊物。1949年3月由港回北京，随南下工作团渡江接管南京宣传机构，任南京军管会新闻处副处长。同年9月，党中央批准刘重新入党，无候补期，并以新闻界代表身份参加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会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刘任出版总署国际新闻局副局长，1953年该局改为外文出版社，刘改任副社长兼总编辑。

1978年2月奉调至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不久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组建工作，同时，中央组织部经过八个月的复查，对历时四十五年刘的冤、假、错案平反改正，恢复他的1931年1月入党的党籍。

刘在参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后，被聘为中美合作出版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文版)》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的中方主席，全书十卷于1985年3月出齐问世。1981年6月刘在负责主持上述全书时已被派任英文《中国日报》总编辑，1985年8月改任该报顾问，刘尊棋是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两届政协常务委员。他现在是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

刘尊棋翻译作品主要有：

《死人之屋》《当日本作战的时候》、《天下一

家》、《月落》、《美国通史》、《艾凡赫》和《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自己撰写的书籍有《美国》和《美国侧面像》等。

目 录

XXXXXXXXXXXX

- 1 刘尊棋小传
- 1 庆龄同志，感谢你的救援！
- 5 一次难忘的谈话
- 8 “一二·九”斯诺夫妇和学生挽臂游行
- 14 “西安事变”之夜——和张学良一席谈
- 21 从东京归来
- 28 郁达夫应称为颓废派吗？
- 45 《郁达夫海外文集》序
- 51 和周恩来同志的几次接触
- 61 江南划期的胜利
- 75 卓越的文化战士风范永存
- 81 “国新社”始末
- 86 从开明绅士到共产党员——刘少白生平
- 111 北欧的“水上之城”
- 115 阿尔卑斯山的心脏
- 120 新疆行
- 124 一位铁骨铮铮的新闻工作者
——忆颂华同志
- 127 无愧于新时代的学人——悼姜椿芳同志
- 131 我是怎样走上新闻记者道路的？

庆龄同志，感谢 你的救援！

1932年底，我被国民党反动派关押在北平的号称“反省院”的陆军监狱里受着非人的折磨，已经一年有余。买通个别看守人，还是可以偷偷得到剪成一条一条的报纸。我看见了上海成立以宋庆龄为主席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且出版英文机关报《中国论坛》的消息。我就和狱中薄一波、刘澜涛等同志商量，可否由我写封信给宋庆龄，揭露狱中对我们的残酷迫害，呼吁改善待遇，出狱抗敌。支部同意后，我就写了一封英文信给她，买通看守人寄出。信中痛陈我们这些青年人个个带着几公斤重的脚镣，锁在牢房里，饮食十分恶劣，缺医少药，不得看书读报，迫切要求释放出狱，上前线抗敌救亡；关在狱中时应该受到合乎人道主义的政治犯待遇。

不久，《中国论坛》报果然刊出了这封信，而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理事会在宋庆龄主持下通过决议，派同盟的秘书长、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副院长杨杏佛(杏佛)到北平调查实况，进行营救。杨杏佛到北平后，偕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盟的负责人胡适和成舍我(《世界日报》社长)一道，首先见了当时的平津军政首脑张学良。张派他的外事秘书王卓然陪同他们三人视察了关押我们的监狱。

我们的牢房是两长条单层对门的小屋，中间是通道。每间牢门上着锁。人头高处有一个可以开关的窗口，窗口上有一个纸牌，写着室内犯人的姓名。他们一个个看了这些姓名牌，走到我的牢门窗口时停了下来，唤我的名字。我走到窗口，看见一个身穿黑色斗篷的人，他用英语问我是否写过信给孙夫人。我说写过。他说他就是奉孙夫人之命来视察北平政治犯监狱的。我说我们实际上受的不是政治犯待遇，而是比普通犯人更坏的残害，这是你亲眼看见的。我越说越情不自禁地高声申述我们没犯任何罪，我们只是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收复失地。他(后来我知道，就是杨杏佛)点着头，以极同情的口吻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们无辜。我们一定促请当局改善你们的待遇。”他说完后，另一位来者(后来我知道，即王卓然)又和我说了几句，也用英语，要我耐心些，表示要尽力改善我们的生活状况。

在这一番不寻常的谈话后，监狱对我们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变本加厉，减少我们“放风”的次数，不许我写家信了。

但是，在大约三个月后，即1933年5月30日，我终于被释出狱。当时正是张学良被蒋介石勒令把平津军政大权交给何应钦，他自己“奉命出洋考察”的前夕。张向他身边的人问有什么事要他办的没有。王卓然就把孙夫人派人视察监狱、要求释放一些爱国青年的话，报告给他。张当即叫他写个报告由他签批了。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利用我和少数别人无条件释放出狱一事大作文章，挑拨诬蔑。在十年动乱中，我受“四人帮”迫害关在洞庭湖中一个孤岛上时，同样遭“四人帮”诬陷、关在北京的监狱中的王卓然，为了证明我于1933年5月的确是无条件获释，曾以八十二岁的高龄，用蚕豆大的字写了十一张纸的材料。正是由于王卓然写的这份证明材料，我才在打倒“四人帮”后复查时，被摘掉“叛徒”的帽子，平反了长期的冤案。

1944年夏，在重庆为一个外国友人举行的酒会上，我遇到孙夫人，提到1933年我得到她的救援而获释的事，表示感激之情。她微笑一下说，“那可不是我个人的力量。”

我现在回忆这段往事，心情十分沉重。四十七年前奉宋庆龄之命由沪来平向我伸出救援之手的杨

杏佛先生，回上海不久就被蒋介石特务暗杀在街头，饮弹逝世。仗义保释我出狱的王卓然先生(解放后由海外回国任国务院参事)，在写了我的证明材料后二十天，于1975年1月30日含冤殒死在“四人帮”的囹圄中。现在为革命和正义战斗终身的、为全中国和世界人民敬爱的宋庆龄同志，竟也溘然仙逝！

(原载《人民日报》1981.6.4.)

一次难忘的谈话

我和杏佛先生只有一面之缘。那是1933年3月间，杏佛先生代表宋庆龄主持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视察北平陆军监狱，访问政治犯时和我隔着铁窗谈了大约十多分钟话。

事情是这样的——

我于1931年7月在北平为参加左联活动被捕后，辗转押入所谓陆军反省院的监狱。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狱中地下党支部同意我的建议，写信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机关报英文《中国论坛报》(China Forum)，我在信中揭露了我们受着非人的待遇情况。不久，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理事会议决，派该盟秘书长杨杏佛到北平，会同北平分盟，调查监狱实况。当时北平分盟主持人是胡适、《世界日报》社长成舍我等。杏佛先生到北平后即偕同成、胡二人会见北平“军分会”主任张学良，由张指派他的外交秘书东北大学代理校长王卓然陪同，视察了坐落在

西华门外草岚子胡同的“陆军反省院”。

那天上午，我们看见几个西装革履的绅士，由一个披黑色斗篷的人带头，左右张望着走近我们的监房。监狱管理员引他们到我的那间监房门口，并把我叫到窗口。那位披黑色斗篷的先生过来问了我的姓名，就改用英语和我谈起话来。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杨铨。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主席宋庆龄派来看望你们的。你写给《中国论坛报》的信，她看过了，刊登出来了，你们有什么要求，告诉我们！我们将转告政府当局，尽可能给你们解决。”

我就说：“我们都是无辜青年。我们的主要要求是释放我们出去到前方抗日。在释放前要以政治犯对待我们，而现在我们所受的待遇比一般人还苛刻。”

他不住地点头。他问了我的年龄，然后说：“我们一定会向政府当局转达你们的要求，尽快改善你们的处境。”

两个多月后我被通知交保释放了。

陪同杏佛同来视察监狱的王卓然先生于四十二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四人帮”迫害，痰死在北京狱中。1975年1月10日他以八十二岁高龄在逝世前夕力疾写出“关于刘尊棋出狱真相的证明材料”，历述杨杏佛视察反省院出门后在汽车上对他所说：“象刘这样的爱国青年，正是今天国家最需要的，